

城镇化扭曲与服务业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

郭进,徐盈之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现有关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基于城镇化扭曲视角,论证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扭曲的城镇化会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调节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据此,文章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对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滞后;城镇化扭曲;现实依据;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F291.1;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5)12-0118-11

DOI:10.16538/j.cnki.jfe.2015.12.011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于2014年达到了48.2%,虽然这具有一定的转折点的意义,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仅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情况表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发展迅猛,其在GDP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直至达到60%—80%(William, 1967; Nicholas, 2001)。然而,中国早在2008年人均GDP就达到了3413.6美元,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一直低于50%,不仅滞后于国内工业发展水平,而且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或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现有研究探讨了生产效率(Ngai和Pissarides, 2007; 谭洪波和郑江淮, 2012)、消费需求(肖文和樊文静, 2011; 陈启斐和刘志彪, 2014)、国际分工(Lo和Liu, 2009; 刘志彪, 2011)以及制度体制(Barro和Redlick, 2011; 江波和李江帆, 2013)等对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虽各有侧重但还不够全面,且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关注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二是将服务业作为整体看待,未能分别针对不同功能的服务业进行差异性分析。毋庸置疑,区域经济发展与其社会

收稿日期:2015-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JY00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01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EYA003);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15_0069)

作者简介:郭进(1989—),男,安徽宣城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盈之(1970—),女,浙江杭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顾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与经济发展同样备受关注的社会结构变迁当属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三次产业联动和社会分工细化等都会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变革和生活水平提高等也都会扩大对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王国刚,2010)。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存在着扭曲现象。首先,与欧美等国家先进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向城镇集聚不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是大规模低技能农村转移劳动力,存在着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其次,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高涨,大量农村用地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工被土地转换“裹挟”至城镇,存在土地城镇化问题(刘航和孙早,2014);再次,由于城镇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不到位,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缺乏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不当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石忆邵,2014);最后,受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影响,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半城镇化问题(汪海波,2012)。基于现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镇化扭曲是否是造成中国服务业滞后的更深层次原因。如果是,城镇化扭曲通过怎样的作用机理对服务业滞后产生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提供配套服务,生活性服务业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居民的消费需求,那么城镇化扭曲对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呢?

二、现实依据和作用机理

(一)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

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 *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借鉴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席强敏等(2015)的界定办法,将 *Inland Transport* (s_1)、*Water Transport* (s_2)、*Air Transport* (s_3)、*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_4)、*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_5)、*Real Estate Activities* (s_6)、*Renting of M&Eq* 和 *Other Business Activities* (s_7) 七个产业部门确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将其余十个产业部门($r_i, i=1, \dots, 10$)确定为生活性服务业。

现有文献尚缺乏对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消费能力定量测算方法的论述,本文从二者的主要功能出发,尝试定义 i 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 p_i 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 q_i ,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p_i = \frac{\sum_{j=1}^{j=35} \sum_{k=1}^{k=7} s_{i,kj} + \sum_{k=1}^{k=7} s_{i,ke}}{\sum_{j=1}^{j=35} x_{i,j}} = p_i^1 + p_i^2 = \frac{\sum_{j=1}^{j=35} \sum_{k=1}^{k=7} s_{i,kj}}{\sum_{j=1}^{j=35} x_{i,j}} + \frac{\sum_{k=1}^{k=7} s_{i,ke}}{\sum_{j=1}^{j=35} x_{i,j}} \quad (1)$$

$$q_i = \frac{\sum_{k=1}^{k=10} r_{i,kc} + \sum_{k=1}^{k=10} r_{i,ke}}{\sum_{j=1}^{j=35} x_{i,jc}} = q_i^1 + q_i^2 = \frac{\sum_{k=1}^{k=10} r_{i,kc}}{\sum_{j=1}^{j=35} x_{i,jc}} + \frac{\sum_{k=1}^{k=10} r_{i,ke}}{\sum_{j=1}^{j=35} x_{i,jc}} \quad (2)$$

式(1)中, $x_{i,j}$ 代表 i 国 j 产业部门的产出; $s_{i,kj}$ 代表 i 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 k 投入到部门 j 的中间投入量; $s_{i,ke}$ 代表 i 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 k 的出口量。如此定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生产能力的内在依据在于: p_i^1 考察了本国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本国其他产业部门进行配套生产的能力, p_i^2 考察了本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服务于其他国家产业部门进行配套生产的能力。式(2)中, $x_{i,jc}$ 代表 i 国 j 产业部门的最终消费量, $r_{i,kc}$ 代表 i 国生活性服

务业部门 k 的最终消费量, $r_{i,ke}$ 代表 i 国生活性服务业部门 k 的出口量。如此定义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消费能力的内在依据在于: q_i^1 考察了本国生活性服务业为本国居民提供最终消费产品的能力, q_i^2 考察了本国生活性服务业为其他国家居民提供最终消费产品的能力。

基于式(1)和式(2),本文计算出 1995—2011 年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五个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徘徊在 0.082 左右,不仅与美国(均值为 0.196)和日本(均值为 0.127)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相差甚远,与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均值为 0.104)以及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均值为 0.093)同样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 2002 年之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生产能力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从图 2 可以看出,尽管 2003 年之后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超过了印度,但是依然徘徊在 0.208 左右,不仅与美国(均值为 0.459)、日本(均值为 0.402)和俄罗斯(均值为 0.318)的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 2003 年之后其增长趋势停止,甚至出现了小幅度下滑趋势。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滞后不仅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层面,也同样表现在生活性服务业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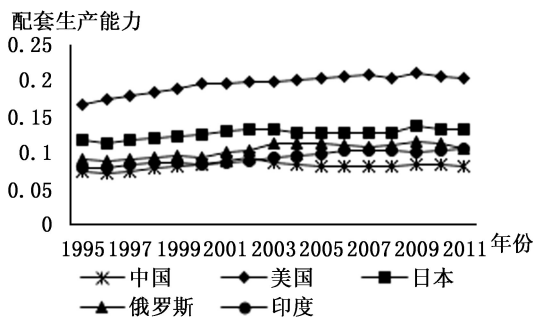


图 1 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生产能力国际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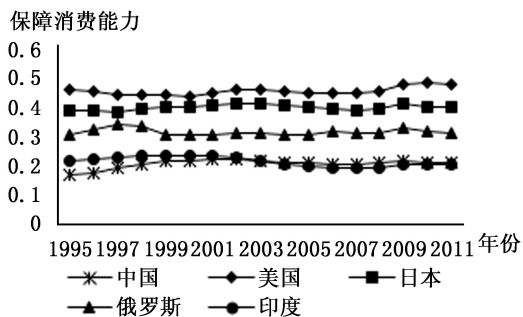


图 2 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消费能力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 *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1995—2011 年) 计算整理得到。

(二) 作用机理

引言部分指出,中国城镇化扭曲现象可以归纳成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土地城镇化问题、城市病问题和半城镇化问题。其中,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强调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主体扭曲,形成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局面;土地城镇化问题强调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导致了土地财政规模日益膨胀;城市病问题强调城镇建设和管理的承载力扭曲,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半城镇化问题强调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目的扭曲,使得城镇化建设失去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意。接下来,拟从城镇化扭曲的四个方面和服务业滞后的两种类型的角度来探讨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

1. 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冲击城镇劳动力市场

农村转移人口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大多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化技能培训,普遍存在劳动技能较差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 年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占比仅为 7.3%,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占比仅为 23.8%,大部分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农民工城镇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城镇的劳动力供需市场,形成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

(1) 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具有知识密集和专业化服务的特征,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席

强敏等,2015),而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造成劳动力需求与供给错位。由于得不到充足的高技能从业人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因此受到抑制,进而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

(2)由于低技能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巨大,具有非竞争性生产要素特征,不存在很强的排他性,成本较低且较易获得。同时,受制于中国城镇消费潜力不足的影响,生活性服务企业也更倾向于提供低端产品,导致生活性服务业的高端化、现代化发展趋势受阻,^①进而造成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

2. 土地城镇化问题扩大了地方土地财政规模

在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存在较大的财政缺口。在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泡沫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32 126.1亿元,是分税制改革前(1993年)的57.6倍。土地财政规模扩张导致大量农村用地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工被土地转换“裹挟”至城镇,被动地完成了城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1)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而存在,产业迂回度提升和分工细化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然而,城镇化扭曲带来的农村转移人口就业问题、新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以及官员交流任职制度带来的政绩考核问题,诱惑地方政府纵容中低端产业规模扩张和粗放式生产。中低端产业部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制约了产业迂回度提升和分工细化,进而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

(2)在土地转换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可以获得的补偿非常有限。同时,在结构性失业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要承担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家庭生活开支、寻找工作成本、子女教育费用和赡养老人支出等,甚至还需要重新购房,被土地转换“裹挟”至城镇的农村转移人口普遍面临“没有退路、没有保障”的双重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往往选择将土地补偿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进而抑制了消费需求,导致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

3. 城市病问题降低了城镇创新活力的发挥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主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创新要素,包括科技人才和研发资本等;二是创新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城镇化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有利于增强城镇的创新活力,驱动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然而,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缺乏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不当等城市病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创新活力的有效发挥。在这样的背景下: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创新要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创新要素的作用效果难以有效发挥、创新成本不断增加,同时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中也容易形成诸多不利于开展创新活动的制约因素,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进而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

4. 半城镇化问题阻碍了城镇消费潜力的有效发挥

受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影响,截至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3%,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现象。由于城镇就业存在形形色色的户籍限制,农村转移劳动力一般从事的是工资低、环境差或存在较大风险的工作(吴晓刚和张卓妮,2014),同时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大部分是中青年劳动力,而他们的父母和孩

^①以低层次生活性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为例,2005—2012年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61%,远高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乃至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高层次服务业的增长率。

子大多依然滞留在农村。在较低的工资水平、较差的工作条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滞留在农村的子女和老人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处于较低水平,阻碍了城镇消费潜力的有效发挥,进而造成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

三、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计量方法介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 PSL 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 CSL 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扭曲指数 $DisUrb$ 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和分析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由于城镇化扭曲可能通过增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 Lab 、扩大土地财政规模 Fin 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 Cre 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产生影响,并可能通过增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 Lab 、扩大土地财政规模 Fin 和降低城镇消费潜力 Con 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上述四个变量设定为中介变量,构建的回归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

$$\ln PSL_t = \beta \ln DisUrb_t + \varphi_1 \ln Lab_t + \varphi_2 \ln Fin_t + \varphi_3 \ln Cre_t + \alpha + \delta_1 \ln Pgdp_t + \delta_2 \ln Gvcl_t + \varepsilon_t \quad (3)$$

$$\ln CSL_t = \beta \ln DisUrb_t + \varphi_1 \ln Lab_t + \varphi_2 \ln Fin_t + \varphi_4 \ln Con_t + \alpha + \delta_1 \ln Pgdp_t + \delta_2 \ln Gvcl_t + \varepsilon_t \quad (4)$$

其中, X_{kt} 为第 k 个控制变量在年份 t 的观察值,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反映服务业滞后内部影响因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反映服务业滞后外部影响因素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l$; ε_t 为残差。

同时,为了检验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关系是否受到控制变量的调节作用,本文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 和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l$ 与城镇化扭曲指数 $DisUrb$ 相乘后的交叉项设为调节变量,依次纳入模型来检验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如式(5)和式(6)所示:

$$\ln PSL_t = \lambda_1 \ln DisUrb_t Pgdp_t + \lambda_2 \ln DisUrb_t Gvcl_t + \alpha + \delta_1 \ln Pgdp_t + \delta_2 \ln Gvcl_t + \varepsilon_t \quad (5)$$

$$\ln CSL_t = \lambda_1 \ln DisUrb_t Pgdp_t + \lambda_2 \ln DisUrb_t Gvcl_t + \alpha + \delta_1 \ln Pgdp_t + \delta_2 \ln Gvcl_t + \varepsilon_t \quad (6)$$

温忠麟等(2012)在论述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时指出,中介效应的存在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①未纳入中介变量前,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②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显著;③纳入中介变量后,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④纳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降低。而调节效应的存在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调节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①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采用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p_t)的倒数来衡量,其内在依据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越差,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越严重;②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CSL):采用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q_t)的倒数来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本文分别计算出农民工城镇化水平、土地城镇化水平、城市病水平和半城镇化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样本的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的代理指标。具体而言:农民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数来衡量;土地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

率的比值来衡量；城市病水平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与城市道路面积增长率的比值来反映城镇基础设施状况，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与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率的比值来反映城镇教育状况，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与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率的比值来反映城镇医疗状况，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与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增长率来反映城镇环境质量，将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城市病水平的代理指标；半城镇化水平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比值来衡量。

3. 控制变量：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衡量；②全球价值链地位($Gvcl$)借鉴 Fally(2011)的上游度指数，将其拓展到区域层面，以区域内所有行业上游度指数之和来衡量该区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4. 中介变量：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Lab)，采用城镇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从业人员数来衡量；②土地财政规模(Fin)，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耕地占用税之和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③城镇创新活力(Cre)，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④城镇消费潜力(Con)，由于缺少有关农民工消费情况的统计数据，同时由于农民工“钟摆式就业”致使其消费习惯基本上保持着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差额乘以具有农村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数来衡量。

5. 调节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_t$)与各控制变量的乘积交叉项。

受到投入产出数据的限制，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段为 1995—2011 年，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China)*、《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 计量方法介绍

城镇化建设对服务业发展带来影响的同时，服务业发展也会对城镇化建设产生影响，致使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 LM 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性。因此，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工具变量为各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本文采用 F 统计量和 ADF 值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各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能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所有拟合系数均为 0 的原假设和残差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判断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且各变量间是协整的。

四、实证结果的检验与分析

(一) 总体计量结果的检验与分析

本文在不考虑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情境下，首先以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CSL)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总体计量结果进行检验和分析。^②

就生产性服务业滞后而言：首先，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

①由于无法获得城镇的 $R\&D$ 经费支出数据，本文采用全国 $R\&D$ 经费支出总额来代替，这种做法的依据在于：根据 2008 年国务院颁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中国的城镇统计口径不仅包括地级以上城市，还包括县镇级的中小型城镇，因此可以判断一个区域的 $R\&D$ 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城镇，乡村的 $R\&D$ 经费支出占比非常低，以全国 $R\&D$ 经费支出总额来代替城镇 $R\&D$ 经费支出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论。

②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未报告总体计量结果的具体数据，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PSL*)的回归拟合系数显著为正,即扭曲的城镇化会加剧生产性服务业滞后的严重程度;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拟合系数未通过 10%显著性检验,而全球价值链地位(*Gvcl*)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拟合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未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产生显著影响,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却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

就生活性服务业滞后而言:首先,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CSL*)的回归拟合系数显著为正,即扭曲的城镇化加剧了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严重程度;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拟合系数显著为负,而全球价值链地位(*Gvcl*)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拟合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具有改善作用,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则会产生加剧作用。

(二)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中介效应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已在总体计量结果的检验与分析中得到论证。针对中介效应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本文分别以各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扭曲指数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中介效应存在的第二个条件也成立。接下来,本文通过表 1 和表 2 对中介效应存在的另外两个条件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说明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

1. 生产性服务业滞后

如表 1 所示,纳入中介变量低技能劳动力供给(*Lab*)之后,城镇化扭曲指数(*DisUrb*)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回归拟合系数由 1.7367 下降为 1.5116,同时低技能劳动力供给(*Lab*)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的回归拟合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判断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中介效应成立,这可能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具有知识密集和专业化服务的特征,而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存在劳动技能较差的问题,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与低技能农村转移劳动力供给之间发生错位,产生了城镇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而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判断土地财政规模(*Fin*)的中介效应成立,其所蕴含的经济意义是指:在土地财政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低端产业对于资金和土地的需求与地方政府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思路产生了“激励相容”,致使地方政府纵容中低端产业规模扩张和粗放式生产,制约了产业迂回度提升和分工细化,进而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

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发现城镇创新活力(*Cre*)的中介效应也成立,这说明以城市病为代表的城镇化扭曲阻碍了城镇创新活力的有效发挥,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进而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

表 1 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i>PSL</i>					
	劳动力供给的中介效应		土地财政规模的中介效应		城镇创新活力的中介效应	
模型	(1)	(2)	(1)	(2)	(1)	(2)
<i>DisUrb</i>	1.3707** (2.43)	1.5116** (2.27)	1.4010** (2.73)	1.5240** (2.86)	1.2366** (1.97)	1.5562** (2.92)
中介变量	0.0238*** (8.65)	0.0317*** (8.20)	0.0918** (2.46)	0.1053** (2.30)	-0.1570*** (-3.77)	-0.1499*** (-3.95)

续表1 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PSL					
	劳动力供给的中介效应		土地财政规模的中介效应		城镇创新活力的中介效应	
模型	(1)	(2)	(1)	(2)	(1)	(2)
<i>Pgdp</i>		−0.0379 (−1.07)		−0.0357 (−1.20)		−0.0319 (−1.36)
<i>Gvcl</i>		0.5758** (2.32)		0.6130** (4.60)		0.5250** (2.07)
<i>F</i> -统计量	2.7731 [0.0967]	3.1618 [0.0736]	6.9839 [0.0079]	4.5165 [0.0222]	7.3545 [0.0000]	9.2644 [0.0000]
协整检验(<i>ADF</i>)	−6.7974 [0.0000]	−4.5812 [0.0041]	−4.0897 [0.0072]	−6.0279 [0.0002]	−4.1839 [0.0066]	−3.6867 [0.0156]

注：***、**和*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中的数值为相伴概率，下同。

2. 生活性服务业滞后

如表2所示，劳动力供给(*Lab*)的中介效应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在城镇化扭曲冲击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低技能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同时受制于中国城镇消费潜力不足的影响，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也更倾向于提供低端产品，导致生活性服务业的高端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受阻，进而加剧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

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发现土地财政规模(*Fin*)的中介效应也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土地转换过程中，农民可以获得的补偿非常有限，面临“没有退路、没有保障”的双重困境，他们往往会控制对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导致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

同样可以判断出城镇消费潜力(*Con*)的中介效应成立，这或许是由于在城镇化扭曲背景下，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部分群体对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抑制了城镇消费潜力的有效发挥，进而加剧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

表2 城镇化扭曲对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中介效应检验与分析

被解释变量	PSL					
	劳动力供给的中介效应		土地财政规模的中介效应		城镇消费潜力的中介效应	
模型	(1)	(2)	(1)	(2)	(1)	(2)
<i>DisUrb</i>	1.3782** (2.24)	1.4180** (2.72)	1.3814** (2.75)	1.4075** (2.51)	1.4102** (2.77)	1.4372** (3.06)
中介变量	0.1330*** (7.28)	0.1194*** (8.37)	0.1195*** (4.62)	0.1202*** (3.31)	0.1080*** (6.79)	0.0929*** (8.51)
<i>Pgdp</i>		−0.0659** (−2.24)		−0.0577** (−2.80)		−0.0637** (−2.60)
<i>Gvcl</i>		0.2669** (2.51)		0.2677*** (3.21)		0.2943*** (7.19)
<i>F</i> -统计量	4.2377 [0.0363]	7.4032 [0.0039]	11.3500 [0.0012]	7.0029 [0.0048]	28.1465 [0.0000]	30.2951 [0.0000]
协整检验(<i>ADF</i>)	−15.3735 [0.0000]	−20.8598 [0.0000]	−7.9771 [0.0000]	−13.1529 [0.0000]	−5.4599 [0.0005]	−11.9217 [0.0000]

(三)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结合模型(1)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调节变量(*DisUrb*×*Pgdp*)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CSL*)的拟合系数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

检验,即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均不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调节。该结论与本文的预期不相符,可能的原因是:当前阶段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更多地反映在工业化发展层面,而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扭曲程度的加深或改善,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影响城镇化扭曲进而对服务业滞后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不成立。

2.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结合模型(2)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调节变量($DisUrb \times Gvcl$)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指数(PSL)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指数(CSL)的拟合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调节,且调节作用表现为加剧了城镇化扭曲的服务业滞后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该结论并不等同于要抑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相反,由于中国目前是凭借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工业加工制造环节的,借鉴库兹涅茨假说,本文认为依靠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改善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状况需要突破某一阈值,因此加快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是上述结论的应有之意。

表 3 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PSL		CSL	
模型	(1)	(2)	(3)	(4)
调节变量	0.0626(0.34)	0.6477*** (6.80)	0.0481(1.37)	0.5637*** (23.86)
$Pgdp$		-0.0169(-1.12)		-0.2910*** (-5.07)
$Gvcl$	0.6263*** (7.76)		0.3667*** (6.79)	
F-统计量	6.0300[0.0008]	27.6221[0.0000]	6.8030[0.0000]	26.4107[0.0000]
协整检验(ADF)	-5.5752[0.0004]	-4.8974[0.0016]	-12.3959[0.0000]	-11.0642[0.0000]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为数据源,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找到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关注城镇化扭曲这一社会现象,采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方法,检验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城镇化扭曲不仅可以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还可以通过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以及通过降低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均受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调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来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具体表现在:

第一,农民工城镇化所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损害了服务业的发展基础,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因此,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提升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例如,针对所有农民工,可以依托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机构和实训基地等,开展基本就业技能培训,使得每位农民工都能获得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技能;针对去特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可以采取个人、企业和政府合作的方式,依托企业提供的特定岗位技能培训机会,争取让每一位农民工都能获得一技之长;针对具备一定技能基础或拥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可以依托高等院校,由政府负责协调,对这部分农民工开展高技能或创业培训。

第二,土地城镇化问题诱惑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从而加剧了服务业滞后。因此,需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有序推进土地用途转换。首先,需要严防地方政府纵容中低端产业粗放生产的行为,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在“简政放权”的同时,矫正“事权下放、财权上交”的不对称局面;打造清廉政府,降低中低端产业寻租的可能性。其次,需要提高农村转移人口在土地转换过程中的资金分配比例,使得农民工在进入城镇之后拥有更多资金和时间来提升自身融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能力,刺激他们对于生活性服务业产品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第三,城市病问题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加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因此,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修复,优化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例如,在综合考虑城镇目前的发展状况、可预期未来的发展状况、目前的承载能力以及可预期的未来承载能力等的基础上,提高城镇建设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程度,保证城镇建设的连续性,杜绝“一届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建立环境污染监测体系,完善环境污染的预警和修复机制,给予高端人才户籍、住房和生活等方面的支持,完善高端人才引进机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市场环境,设立企业创新基金,给予开展创新活动的服务业企业以税收减免或转移支付等政策优惠。

第四,半城镇化问题所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现象抑制了城镇消费潜力的有效发挥,从而加剧了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状况。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对于改善中国目前的半城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户口背后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后仍需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对农村转移人口在工作、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歧视,共享城镇化建设红利,扩大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主要参考文献:

- [1]陈启斐,刘志彪.需求规模与服务出口: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J].财贸经济,2014,(7):82—94.
- [2]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51—160.
- [3]江波,李江帆.政府规模、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与生产服务业发展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1):64—76.
- [4]刘航,孙早.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5—17.
- [5]刘志彪.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兼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3):13—19.
- [6]石忆邵.中国“城市病”的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4,(10):1—6.
- [7]谭洪波,郑江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9):5—17.
- [8]汪海波.我国现阶段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及其重大意义[J].经济动态,2012,(9):49—56.
- [9]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经济研究,2010,(12):70—81,148.
- [10]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 [11]吴福象,沈浩平.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3,(7):89—98.
- [12]吴晓刚,张卓妮.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14,(6):118—140.

- [13]席强敏,陈曦,李国平.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研究——以工业效率提升为导向[J]. 中国工业经济,2015,(2):18—30.
- [14]肖文,樊文静. 产业关联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研究[J]. 经济学家,2011,(6):72—80.
- [15]Barro R J,Redlick C J. Macroeconomic effects from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tax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1): 51—102.
- [16]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 [17]Fally T.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US[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Mimeo, 2011.
- [18]Lo C P, Liu B J. Why India is mainly engaged in offshore service activities, while China is disproportionately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2): 236—245.
- [19]Ngai L R, Pissarides C A.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429—443.
- [20]Oulton N. Must the growth rate decline? Baumol's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1, 53(4): 605—627.

Distorted Urbanization and a Lag of Service Industries: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Study

Guo Jin, Xu Yingzh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about the lag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China ar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fail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realistic evidence of the lag of service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ducer and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i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distorted urbanization on the lag of service indus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storted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ng effect on the lag of Chines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by increasing low-skilled labor supply, enlarging the scale of land finance and reducing urban innovation vigor, and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ng effect on the lag of Chinese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ies by increasing low-skilled labor supply, enlarging the scale of land finance and restraining urban potential consumption. Besides,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global value chain plays an aggravating role in the effects of distorted urbanization on producer and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ies. Therefore, it provides some relevant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tification of distorted urbanization.

Key words: a lag of service industries; distorted urbanization; realistic evidence; acting mechanism

(责任编辑 石头)